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 一士类稿

徐一士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 一士类稿

徐

士著

期 限

新世纪万有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士类稿/徐一士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4836-6

I. 一… II. 徐… III. 中国-近代史-掌故 IV.  
K25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952 号

|           |     |     |     |     |          |     |
|-----------|-----|-----|-----|-----|----------|-----|
| 总 顾 问     | 陈 原 | 王元化 | 李慎之 | 任继愈 | 刘 杲      | 于金兰 |
| 学 术 指 导   | 顾廷龙 | 程千帆 | 周一良 | 傅璇琮 | 李学勤      | 徐苹芳 |
|           | 傅熹年 | 黄永年 |     |     | (传统文化书系) |     |
|           | 金克木 | 唐振常 | 丁伟志 | 黄 裳 | 董 桥      | 劳祖德 |
|           | 朱维铮 | 林载爵 |     |     | (近世文化书系) |     |
|           | 董乐山 | 殷叙彝 | 陈乐民 | 蓝英年 | 汪子嵩      | 赵一凡 |
|           | 杜小真 | 林道群 |     |     | (外国文化书系) |     |
| 学 术 策 划   | 王 士 | 林 夕 | 柳 叶 |     |          |     |
| 文 库 工 作 室 | 俞晓群 | 杨 力 | 马 芳 | 王越男 |          |     |
|           | 王之江 | 柳青松 | 袁启江 |     |          |     |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周北鹤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 数 138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00 元

## 出版说明

中国有悠长的历史，而又历来注重于历史的记载，故有历史王国的称誉，综观全球，是应该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历史学中，有它派生的一门学问，叫做“掌故学”。虽然“掌故”也是历史，但与历史略有不同，在古代，历史学与掌故学并没有什么差异，以中国最知名的史学著作《史记》和其他三部著作合称为《四史》的为例，它们就生动活泼，记述人物和事迹，栩栩生动，毫无呆板死硬之感，便是说只要是合乎历史的真实，人的一举一动，言语的鄙俚口语，都可以入史。例如刘邦，在司马迁笔下，就活脱一个流氓皇帝，毫无后来史传的太祖高皇帝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模样。到了《宋史》以后，史成了国家钦定，由私家著述成为集体执笔，死板枯涩，毫无生气，照抄《起居注》、《实录》等公家文献，令人读来味同嚼蜡。所以裴注胜《三国志》，《世说》胜《晋书》，唐、宋以迄元、明、清，私家野乘，其价值远过正史。那些著作，都应该被称为“掌故”，以有别于正史。

掌故之学，虽然代有著述，不绝如缕，但是百年来由于西方科学治史的方法传入中土，掌故之学，更又辉煌一时，成为有别于历史的一种专门学科，其中最知名的学者，便是本书的作者徐一士。

徐一士（1886—？），江苏宜兴人，宛平籍，其卒年不详，大致在建国以后六十年代前后。谱名仁钰，字相甫，一士乃其笔名，遂以名世。其著作有本书及《一士谈荟》、《凌霄一士随笔》（与其兄合作）、《亦佳庐笔记》、《近代笔记过眼录》等。徐一士谦逊退让，不善交际，虽著述等身，但不自收辑，上述数种，仅受友人怂恿，勉辑为集，其散佚零篇，犹不知几何，未能流传后世。

徐一士的掌故文章，其所以能成为一家之言，身后犹多次翻印出版，自有其特独的长处，不独与繁多的清人笔记不同，即后起之秀，亦不克与之拮颉，其原因约有下列数端：

其一，以科学态度治掌故，这一点是徐一士和清人笔记最大的分野，因为徐一士学贯中西，深谙西方以科学治史的方法，并不似前人的道听途说，信口开河，他的著作一言一句，都经过缜密思考方才笔之纸上，这一点和他的同乡孟心史有相同之点。

其二，家学渊源，宜兴徐氏本为常州的世家大族，他的伯父徐致靖（子静）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从兄徐仁铸又是戊戌之前在湖南学政任上和陈宝箴缜密合作先作改革试验田的要角，政变失败后，徐致靖倖免于难，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父子共同命运。徐氏父子回乡闲居，正好给那时年还幼少的徐一士以最好亲炙学习的机会。徐一士在伯父和从兄的薰导指点下，他从少便学到旁人所无法学到的知识，所以他的著作以晚清这一时期为最多。再加上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读遍他伯父、从兄的所有藏书，所以他的掌故之学，独步一代，无人可与比拟。

其三，徐一士谦逊退让，声华不露，似可说学胜于才，他的文章不算惊才艳绝，而可说平淡如水，绝少波涛起伏，但却以平淡胜人，所引史实，多经仔细扒梳，无一字无来历，即一标点之微，也做到准确无误。这一点不但在当时书刊上极为罕见，即在今天，也很少人能做到。

建国以后，本书迭经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重印，但多根据当时情势，颇多任意改动之处，断句标点谬误地方亦到处可见，颇受人诟病。本书的排印，系根据四十年代最初版本，仅于明显错误之处予以校勘改正，使之成为徐先生著作较善的一个版本。

## 瞿 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历年撰述抽编一部《一士类稿》，要我作一篇序，这是极荣幸而且极有意义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谓掌故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先加以讨论。我以为中国正史与杂史的分途自宋始。我们读《史记》、《汉书》，觉得史家叙述一个重要人物每从一二节上描写，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即一代兴亡大事亦往往从一件事故的发生前后经过着意叙述，使当时参加者之心理与夫事态之变化都能曲折传出，而其所产生之果自然使读者领会于心。例如《史记》写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张良谏止一事，酈食其的话是有理由的，而张良的话举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见高祖时的偶然事态，以及仓卒间借箸代筹的神情，挽回千钧一发的局势就在他临机应变的几句话。可知当时彼此间的微妙心理。这样关系千古治乱的大事，就是这样诙谐似的被决定了。所以不但高祖与张良两个人的个性暴露无遗，而且可以将当时主张恢复封建与主张沿袭秦制的两派人心事和盘托出。司马氏之所以为良史，正在于这些地方。后来史家每办不到而渐趋于官样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笔之人多少有一点公务的史职在身，而后代的文网较为苛密，加之私家的传说太多，不是公认的话不敢说，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据，因此虽然极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记》那样活泼泼地了。不过唐以前的史家虽或不能尽情发挥，犹能于剪裁去取之间示其微意，使后人善于读书者自己去领会。例如陈寿《三国志》记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一事，在《本纪》里面一字不提，而但载太后令及大将军上言，便是明明告诉后人这两篇文章是一种掩饰之词，更足见高贵

乡公之为冤死。所以照这样看来，后世史家所依据之官式史料竟多难于置信。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难于置信，若是并完全史料而无之，则更不用说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细心体会，又有谁知道呢。

有许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亲眼看得到的，这种史料不知埋没掉多少而成为千余年的煨烬尘土了。《文选》载陆机吊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据其所采用者而观之，则当时史臣所收录者不但是一篇口传的令，而且将弥留顾命时的情形也都记了下来，甚至关于遗令的事后情形也都有一贯的记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当其大渐时的言语，必不暇自己动笔作书，而必是尽职的侍臣据实笔录以供他日参考。而所说的话又不是都可以公开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于秘阁，而成为一种秘密文献。这一段纪载显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状态之一斑，较之任何纪载更有价值，而陈寿作《三国志》时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检阅到这件档案呢，还是认为无关于政治而略去不载。总而言之，不能不说史家对于史料之去取虽良史不免有失当的地方。

正史杂史之分途，也可以说就从《三国志》启其端。《三国志》固以文笔严洁见长，而叙写事实亦不免有简略之失，为后世官修史书之徒以勾勒轮廓为尽职的开一先路。至于杂史之多，也就起于三国。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有本处的事非本处不能知的，有甲处的事自己纪载不详而转见于乙处丙处的。其时宣传与反宣传的工作都很利害。例如《曹瞞传》是吴国人作来骂曹操的，我们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为人。又如陈群、华歆、王朗一般人寄书与诸葛亮，明明是代魏国劝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当时的中原士大夫对于流亡在西南者之一种同情。推而至于一切琐屑的遗闻佚事，都有其所涵之意义。所以陈寿不采而裴松之采以为注，现在拿裴注与陈志合看，觉得有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杂史之不可废有如此。

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湮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如三国事实之见于裴注所收，已经极不容易，这是因为三国鼎峙次第灭亡，到了晋武平吴，回顾汉末以来之史事，其间恩怨已经消泯，没有很多避忌，所以才能如此。且私家纪载总不容易流传久远，尤其在刻书之风未盛之时，零篇断简，靠着传钞，最难持久。但看司马光修《通鉴》，所采唐及五代之事实见于杂史者多半今无传本，足见采摭群书是一种极可贵的著述事业。然而这些杂史若一种种单独的看来，大都不免彼此抵牾而生出疑问，又须加以抉择比较审慎而存录之。所以裴氏《三国志注》与司马氏《通鉴考异》为功于史学真不小。

唐人修晋以后的史，很喜欢采录故事，往往琐屑至于类似笑谈。前人颇有不以为然的。这诚然不是史的正裁。然而史家得不着更好的材料，又将如之何呢。就是以故事为史，也还可以考见一时的社会风俗时代心理，这也不是无益的呀。自宋以后，私家的碑传文字盛行，于是一个人的仕履世系言论著述倒可以了如指掌，而其人之性情好尚以及其行事之实迹往往不能窥见。于是宋以后之史多是钞录些谀墓之文，一传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处人、某科出身，历官某职、某事上疏如何、某年卒、著某书、子某某，几乎成了一种公式，千篇一律，生气全无。这样的史还能算史么？

宋以后的史是必须连同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之流读的。不但事的曲折隐微，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几乎全找不着。就是政治社会制度之实际状况，也必须靠着另外的书来说明。譬如宋元丰之改官制前后种种，在正史上只能知道一个大概。至于究竟怎样运用的，读了庞元英《文昌杂录》、洪迈《容斋随笔》，方才能知道得多一点。

照史例的原则说来，纪传体是以人为纲的史，编年体是以时代为纲的史，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为纲的史，通典体是以制度门类为纲的史。严格的注重体例组织，则详于此必略于彼，若要打破这个藩篱，将四者通而为一，则必须另有一种新的史裁，融会前人之长，为后人辟一途

径。这是现在尚办不到的。为救济史载之拘束以帮助读史者对于史事之了解，则所谓掌故之学兴焉。

掌故之学究竟是什么呢？下定义殊不容易。但从大体说来，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屑琐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这种条件，本来是治史者所当同具。但是所谓掌故学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装有无数故事的人，则掌故之学便失去真价值，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然而仅有方法而无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由于亲族乡党举主故吏座主门生同年同学乃至部曲宾僚种种关系错综而成。六朝人讲究谱学，但能将这本帐记在心中，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技能，后世的人事更加复杂，一本帐也记不清楚，必须会合无数本帐方能足用。最好是一生致力于此，若仅恃临时检阅，岂能得当。所以掌故学者之职务，乃是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词典。

寻常的解释又以为掌故之学即是典章制度，这种解释自然不是全无理由。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尤其需要实践的经验，许多书策上关于典章制度之纪载，因为名物之变迁，习惯之变迁，每不易于索解。宋初的人为了一个入阁仪的讨论，费了无数唇舌。考其经过乃是因为唐朝的入阁是便殿召对的一种简单的仪礼，后来连这简单仪礼也变成稀有的事，因之入阁仪反成朝仪之正了。同一入阁，在某时期是这么一回事，过了这个时期又另是一回事了。这还是名物具在的说法，若在明、清两代则并名物也不是了，苟非博通书史而又能以后来的习惯参较而推测之，又安能了然于胸中。宋朝的许多制度，元朝人已经不得其解，元朝的制度，我们也很多不得其解，就是清朝的制度，虽然老辈还在，也有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凡是书策上所不见的，将来必至终古无传。而书策所已载的，也还待后起之疏通证明，方

得其用。

即以彰彰于书策者而论，比如侍郎一官，汉朝人所谓官不过侍郎，断不是唐朝的侍郎，这是有历史常识的都知道了的。唐朝的侍郎又与宋元丰以前的侍郎不同，宋初的六部侍郎不管本部的事。而明、清的侍郎又与宋的侍郎不同，宋的尚书、侍郎都算从官，少有参与政务的机会，明、清的尚书、侍郎则均成为共同处理政务之一员。至于民国各部的次长，虽与清朝的侍郎近似，实际上亦尚有分别。次长是部中次官，而侍郎则虽名为卿贰，实在与尚书同为一部的长官（部中同称为堂官）。这些都是易于混淆的地方。所贵于掌故之学者，就在能把握其意义而因之豁然贯通，不至于史事有误解。

治近代掌故学之资源，所谓笔记一类书占大部分。明代这种书较多，而传于今者也有限。清代的名著如王士禛《池北偶谈》、刘廷玑《在园杂识》、查慎行《人海记》、王应奎《柳南随笔》、赵翼《檐曝杂记》、阮葵生《茶余客话》、昭槁《嘯亭杂录》、英和《思福堂笔记》、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梁章钜《归田琐记》、陆以湉《冷庐杂识》、周寿昌《思益堂日札》、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薛福成《庸庵笔记》……，他们多半生当文网严密之时，下笔不敢不慎重，所以大致没有什么无稽之谈。而且他们所处的地位又多便于考究朝章国故之类的，所以秉事立言大都能不悖于著述之例，决不是泛泛传闻可比。在这几点上是后人胜于前人的一种事情。加以耳目较近，研究起来易感兴趣而且易于着手。按春秋三世之义，所见所闻所传闻，递远则递略，愈近则愈详，然则治掌故必从清代始，这是极自然的。有清末叶文字之禁骤然失效，从前闷着不敢说的一切历史上疑案渐都成为好事者之谈助，于是谈佚闻的纷然而起。数十年来私家刊行的专著，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一鳞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胜数。人人感觉兴趣，遂成一时风尚，至今还是方兴未艾。

如果将这些书的内容分析起来，则大概不外乎三类：一是记制度风俗的变迁或是记某种特殊制度风俗；一是记某人的事迹或是关于某

人的佚话；一是记某事的经过或是关于某事的特点。此外固然还有，而直接有关于史学者如此而已。这些书大半是拿零星的材料随意写来以资谈助，最普通的缺点是不曾注明出处，所以材料的正确程度大都不易于断定。

至于正经谈到掌故，则有必须注意的以下几点：

第一是作者的问题。寻常人的见解以为凡是身历其境的必然正确，这诚然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但是据以往的种种经验看来，实不尽然。著者本身如果与本事有关，则其下笔或不免以下三种意义：一因恩怨而淆乱是非；一因辟谤而加以饰词；一因表曝而多加渲染，三者有一于此，即不能视为正确。唐人关于李、牛之纪载，宋人关于熙宁、元祐及洛、蜀之纪载（实则宋人一切纪载都不能说无作用），其例比比，无烦征引。稍有史学常识者也都知道。愈到近代，著书之方法愈工，掩饰变乱之技巧愈进步，意在彼而言在此的不可胜道。其内容所涵之意义，决不是疏浅的读者所能遽察。

第二是时代的问题。以同时人记同时事，虽然其动机能影响其正确程度，但是舍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依据呢？我们无论如何也只可取其比较可信而已。可是要知道同一亲历其境之人，其所纪述是否不错，还大有分别。就以我们设身处境而论，亲历的事，虽然其情景大致尚在心目，而事实发生之前后当时在场之人物未必能一一记忆真确。动笔的人如不细心推敲，则信笔所至必不免错误。这是确有证据的。《通鉴考异》于晋天福四年下云：“五代士人撰录图书多不凭旧文，出于记忆及传闻，虽本国近事亦有抵牾者。”不经《通鉴考异》之考订，读者又何从一望而知其错误呢？

第三是著述能力的问题。同一记事而有工拙之不同，工于记事的能把握一事的中心，自然易得其真象。不然则所记者皆枝叶零星，而离事实愈远。近人每以为就某一个有名的人作一番问答，便可得到些掌故。譬如赛金花的生前就很有人喜欢向她打听她的身世，笔录下来，便成好材料。殊不知赛金花这样的人不是真能谈“天宝遗事”的

人，倘竟以她的信口所谈为根据，则未免离题远矣。著作的高低不仅在秉笔之人，也要看他所从听受的人是否够得上供给良好的著作材料。

第四是文字正误的问题。文字上少了小小的一画，便可以引起意外的误会。西洋人记明末的中国海上英雄 Limafong 在吕宋与西班牙人战争的事，从前中国的译者因其原文于 m 与 a 之间未曾隔断一小画，遂误译为李马奔。而不知方志中固赫然有林凤之名也（闽、广人多于名上加阿字，故人称之为林阿凤，而西人译其音如此，又粤语林字为闭口音，故读为 Lim 而非 Lin）。又如根据西文纪载而言台湾史事的，谓清初有“高星楷”其人占领台湾奉明正朔。按其事乃是郑成功，郑曾蒙赐姓朱，故其部下称之为国姓爷，由音译词回，乃使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变为面生可疑的“高星楷”了。两事相类，姑举以为一种特例。至于寻常文字上的舛错，更是往往而有。凡干支数字之类，下笔最易致误，在下笔者出于无心，而考证者遂费无穷唇舌矣。向来考据家都说碑板可以证史文之阙误，诚然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必以碑板所有均可补史之阙，碑板与史不同均可正史之误，那也是很危险的。（大概碑志往往根据本家的行状，而行状或出于子弟仓卒撰成，甚或丐人代撰，其不符事实者每不暇详究。又近代习气专以文词为重，并不求其成为信史，故碑志更不可深恃。）以我个人所经历，碑板之误倒有出人意表的，所以误不误须就多数的记载加以鉴别，而不能凭单文孤证。

所以严格的谈掌故，往往将其所记之事与其时其地其人参互钩考起来而发现彼此之间有无数的扞格矛盾。然则这种记事竟绝对不容其存在了么，却又不然。知道他致误的病根而去其误，再从其他方面以证其所余之真，则又不但通此一事而且可因此会通许多事。在掌故学者看来，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没有不可用的材料。乃至平凡而零碎的片纸只字，都是很可宝贵，在某种适当的地方，必有用的。这真需要老吏断狱的能力，头脑要冷静，记忆要丰富，心思要灵活，眼光要锐敏，不以辨证为目的而却能尽辨证之用，这才是所需要的掌故学者。

我很感觉到掌故学者殊不容易养成，这种学问凭实物研究是不行的，凭书本的知识是不够的，不是有特殊修养，必至于事倍功半。我们现在需要年高阅历多见广闻的人，将他们的知识经验以系统的方法津逮后学，使后来的人可以减少冥行摘埴之苦。

但是世上没有样样俱全的人，假如他本是一个史学家，而又深受老辈的薰陶，眼见许多旧时代的产物，那是最好的了。不然则本其超群绝伦之智慧，从故纸堆中一一研究出来，凭着智慧的想像以捋捋而成一个真的活动事实，这也是极难能可贵的。但是除了他本身的能力而外，还须有传授他人的能力，使人人可以得其沾溉。这更要紧，更值得我们的宝贵尊重。

徐一士先生的谈掌故出名，由于三十年来在各报纸各杂志所发表的各种稿件。他的号原不是这两字，因为笔名出了名大家都不大叫他号了。大家知道他是掌故家，于是他的职业也被埋没了。以我所知，他决不是像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样掌故家，然而就其治掌故学的 ability 而论，的确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后人的地方不少。这是值得疏解的。第一他富于综合研究的能力。他能将许多类似的故事集中一起，而辨别其孰为初祖孰为苗裔，何者相异何者相同。第二他能博收材料。他的谈掌故，好像取之于笔记及小说者甚多，然决不仅以此为对象，其所驱遣自正史以至集部旁及外国名著时人杂纂，凡有所见均能利用。甚至旁人视为毫无价值的，经他的利用，也无不恰当。第三他有极忠实的天性。学问的成就，朴诚是第一条件。无论何种学问，自欺欺人，总要露马脚的。他的读书作文，不肯一字放过，不肯有一字不妥，是天赋以治掌故的极好条件。所以他的根柢极充实，而一下笔一开口的时候，都显示极沉着慎重的态度，这不是他的迂阔，而是他最聪明不失败的地方。但是这个道理，别人虽然也知道，却未必像他那样自然，所谓仁者安仁，诚哉其不可及也。第四他有绝强的记忆力。他的博综固然不必说，若无好的记性，决不能触类旁通，这也不是读死书所能办得到的。他需要记忆古今多少人的名字、籍贯、世系、年代、仕

履、师友，尤其近代的人乡会科分名次座主房师，乃至某科的什么题目，率能有问必答如响斯应，还不能不说先天后天都有关系，寻常人所不易及。（以我所知，留滞诸友之中，胶西柯燕龄君，于正史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数家珍，乃至金石、图录、载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种种难于记忆之事，皆罗于胸中。尤熟于历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别人认为诘屈聱牙不能句读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证明如指诸掌。与徐君可谓一时二妙，惟柯君不屑意于著述为可惜耳。）第五他有侦探的眼光。每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间隙。他人纪载之真伪是非，何处是无心之误，何处是征引之误，何处是传闻之误，必难逃其锐目。我们朋友所作的文章，凡是请他过目的，必能看出许多漏洞。使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我们最易犯的毛病，是长篇文字前后不能照顾，以致语气失去连贯，又据他人的话往往不及考察其有无舛误，他却必能替我们指出。有了这些特长，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也可以说自有徐君而后掌故学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可以期待今后的发展。

徐君出自江南世家，久居蓟北，科第簪缨，人伦冠冕。戊戌政变，他的伯父子静先生父子因主维新而躬罹党狱，更是众所共知的。所以他的家世环境又是这样给予他许多便利，能以身当新旧之交而饱闻当世之事。他又随宦外省，兼历京曹，而于各种政治制度皆亲见其实地运用情形。不但此也，还有一件，他虽是五十以上的人，而早年曾受近代式之教育，他长于英文，富于近代学识，所以他的治学，条理绵密，态度谨严，的确是渊源于近代科学思想以及欧文的技术。至于旧学的修养更不必说。旧知识与新训练是不容易备于一身的，徐君这一点资格更是可贵了。

徐君与我虽有世交的关系，而情谊则完全是从学问来的。旧学新知，时常互相浚发。十余年来株守的踪迹相同，思古之幽情也相同，然而只是以彼此讨论为乐而已，也并未曾计议过预备从事于何种学问何种著作，岁月如流，相顾皆成老惫，往者已不可谏，来日更复难知。不

免想到他的笔记丛稿，恐怕日久散失，未免可惜，于是极力怂恿他早些整理出来，设法先行出版，这话也说了几年了，直至最近方有成议，居然第一部的《一士类稿》可以出书了，出书之后，必能风行一时，不消说得。我所愿在这里唤起读者注意的，则有以下几点。第一请看他所运用的材料，有许多已经不容易看见的，或是手迹，或是孤本，在当时都是各方面送来借来抄来的，而藏有这些手迹孤本的人，亦必极愿意使他能以长久公之于世，所以这部书之出版，不仅是徐君个人之幸，也是多数人所引以为幸的。第二请看他的选材，真合于所谓无一字无来历一句话，决不曾有一条不注明出处，不但著述的体裁理应如此，而且徐君之心重在存公是公非，而并不是欲成一家之言，其微意亦可概见。第三请看他的严正公平态度，个人恩怨固不消说绝对没有。就是有所抑扬，也必先有一番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的手续。实在是众恶的了，也只有哀矜弗喜而决无投井下石。像这样的谈掌故，真可以成为绝学而信今传后了。最后论到文字上的技术，也有他的特长。他所写的各稿，行文不事华藻而措词善合分际，文从字顺，看似平易，却是下字均有斤两，虽喜考证，而笔端不流于沉闷枯燥，仍有含毫邀然之致。不多发议论，而衡断则甚精核，耐人寻绎，大凡繁征博引，往往照顾难周，他却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处处顾到，左右逢源，妥适周匝，头绪虽多，而组织严密，条理秩然。有时也纵笔题外如所谓“跑野马”者，然若六臂之在手，操纵自如，归缩仍在题中，绝无散漫脱节的毛病。至如涉笔成趣，也每有之，皆能出以自然，余味曲包，而又保持文格，不落鄙猥。荦荦诸端，略如上述。文字技术与学识经验相辅相得，以成其作风。他对于作品的责任心极重，所以字句上每煞费推敲，读者若不留心，或者但觉其平易，以为写来不甚费力，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也。诚然有时很像只是钞录的工作，但决不为读者所嫌恶，反觉引人入胜，读之惟恐纸尽，不是材料与技术两样都臻绝选，何能如此！

我还敢大胆的说，徐君这部书出版以后，或者分批出版以后，其中所征引的书有许多已经极不易得见而又是读者所极渴想的，恐怕要依

赖徐君的书而幸传，将来的人或许会从徐君所征引者辑出许多未见的书，如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一样。（我曾经感觉近人刊布的笔记很有些有价值的，可惜铅印石印的有很多已经绝版，就是木板书也因为印刷不易，流传有限，而且这类书往往被人看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不为藏书家学问家所重视，甚至于图书馆也不收，也没有人拿来著录作提要，也没有人替他翻板登广告卖钱，久而久之，就是风行一时的书也就可以无影无踪，若是本来不多见的，并书名也必至于湮没了。然而这种书是普通人所极愿意看的，只是苦于看不到，于是怂恿徐君将他所见过的这类书尽量将内容介绍于读者，仿佛作一部笔记选的样子，前一二年曾经发表若干在《中和月刊》，很得读者赞许。）

但是徐君的著述事业岂得以此为其封域。中国史学上待豪杰而兴起的应作的事业尚甚多，如徐君者既受社会的尊敬，则应致之于宽闲静穆的环境，供给物质上种种便利，趁他未至甚老之时，尽其能力，作一更大的史学上贡献，庶几不负天生此材。而徐君犹耽耽穷居，家无长物，参考书籍每仗旁求，钞缮辛劳又乏助力，还要较量米盐奔走衣食，使无一日之闲暇，以尽其所长，读者又岂能不于展卷之余为之浩然而生无限之同情耶！

徐君平日的态度既然是那样的谦虚而谨慎，则我也不敢在他面前恣意作溢美之词。不但不应作溢美之词，就是恭维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意中所要说的主要之点，还是治掌故学之甘苦。谈掌故或者可以信口乱道，但博听者一时好奇，徐君却不是这样的谈法。他最初固然是为着兴趣，据他说自幼喜欢听人谈旧事，喜欢看小说笔记，也喜欢讨论小说笔记中的典故，而抉发其得失。但是书看得多了，自然而然的引导他走向综合研究的道上，尤其近年谈掌故的书如此之多起来，每每更使他对于这些书有比较辨别之必要，日积月累，便成功他的一种专门。而我们看了他的文章以后，也觉得掌故学的确可以成为一种学问，像他所用的方法是极对的。

假如我是在这里恭维的话，却并不是恭维徐君一个人。我认为这宗学问将来必要更进步，而后起之秀必有突过前人的地方。为什么呢？第一过去的人生在那个环境当中，觉得一切是当然的，是平淡无奇的，是不值一谈的，环境嬗变之后，便又成为陈述而无从把握了。中国人向来很少保存当代史料的习惯，所以事过境迁都只剩些雪泥鸿爪。今后的人经过从来未有的剧烈变动，历史的观感较前人定觉深切，保存史料的常识亦必较为普遍，于是应用的材料必然较多。虽说近年各种天灾人祸的摧毁损失不少的文献，然而较之前人呢，增广见闻交换信息的机会究竟容易得多了。凭这一点也就有无限的宝藏足供今后的学者的开发。第二，因为近代交通方式的便利，社会各层声气的豁露，事实究竟不容易变乱。纵然人类的感情冲动，一时的政治作用，不免有时操纵着，然而完全颠倒黑白是不行的。加以今后的人能运用科学方法来治史，其鉴别判断发挥的能力必非前人所能及。第三，学问以专而愈精，掌故学范围既如是之广，其中有某种人认为极易了解不需解释的，而另一种人则又认为不得其解，有看似平淡明白的，而细按起来却又说不出其中的委曲。总而言之，需要系统的整理，使每一名词得有正确详尽的解释，时代隔着愈远，则了解愈难而愈不肯轻易放过，其推求之方法亦必愈精。譬如颜师古离汉朝比我们近，然而颜注《汉书》便有许多疏陋的地方，不及近代人之考证精确，并不是说近代人的学问一定胜过颜君，不过近代人读《汉书》之苦甚于颜君，所以不得不认真考究而已。所以将来关于国学的一般趋势，都要比现在进步，但是必须经过若干年之后，有多数专门学者苦心整理出来，使之成为大众能了解能欣赏的东西。在这青黄不接之际，感觉到学术人才之尚不足用，这是有的。以掌故学而论，我与徐君都常常觉得前途很有乐观的气象，而近来同志之多，各有所长，而且能互通声息毫不隔阂，因之而交换见闻的机会不少，实有从前所不及料所不敢望的，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最后再谈到材料的问题，从前的人固然不甚注意保存史料，就是